

德国和平统一模式的复合权力结构研究

夏 路

[内容提要]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后, 1990年德国通过和平方式完成了国家统一进程。与以往“行为体取向”的研究解释不同, 本文拟采取结构性取向的“复合权力结构”视角, 尝试通过对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进行分析, 论证“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德国和平统一”的研究假设。该结论对中国和平统一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德国 和平统一 复合权力结构

[作者简介] 夏路,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民族分裂与国家统一问题研究。

从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先后建国, 至 1990年 10月 3日东德宣布集体加入西德, 穿越 41年的历史风雨, 德国最终通过和平模式实现了国家统一。什么因素引发了德国从国家分裂到和平统一的巨大转变? 以往的德国统一问题研究多偏重于行为体取向,¹认为该进程是单向历史发展的结果。然而, “历史解释如果不考虑结构的力量而仅依赖于对行动者明确意图的解释, 那将是非常局限的。”^④分裂国家统一这类宏观政治变革性问题, 需要关注行为体之外的权力结构。为此, 本文尝试从“复合权力结构”视角对德国统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 探讨影响其和平统一的关键性权力结构因素。

一、复合权力结构与德国和平统一

传统权力结构理论有两大经典: 肯尼思·华尔兹的“体系权力结构”与亚历山大·温特的“社会权力结构”。它们提供了结构的地位、结构的内涵, 以及结构的层次三大有益的研究视角, 但在理论构建上存在明显的不足。体系权力结构作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 强调了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 关注到了硬权力结构, 却忽视了软权力结构; 重视全球权力结

构, 却忽视了地区和国内权力结构。社会权力结构作为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 强调权力结构的决定性作用; 注意到了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的结合, 但过于偏重软权力结构; 重视全球和国家权力结构, 但忽视了地区权力结构。传统权力结构的不足, 不仅源于其概念本身的缺陷, 更源于新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单独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薄弱与偏差。借鉴传统权力结构的成果与不足, 本文拟提出“复合权力结构”的新范式, 尝试为分裂国家统一问题的分析提供综合而深入的研究视角。

¹ 关于德国统一的研究参见: A. James McAdams, *Germany Divided: From the Wall to Reunific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Bernhard Heiger and Leonard Waveman, *German Unifi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H. G. Peter Wallach and Ronald A. Francisco, *United Germany: The Past, Politics, Prospects*, Greenwood Press, 1992; Manfred Gortmaker, *Unifying Germany 1989-19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ekka Kalevi Hamalainen, *Uniting Germany: Actions and Reactions*, Cambridge Great Britain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94; Gert-Joachim Glessner,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in Germany: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Manfred Gortmaker, *Unifying Germany 1989-19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晏小宝: 《德国的统一》,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年; [台] 洪丁福: 《德国的分裂与统一》,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年; 萧汉森、黄正柏: 《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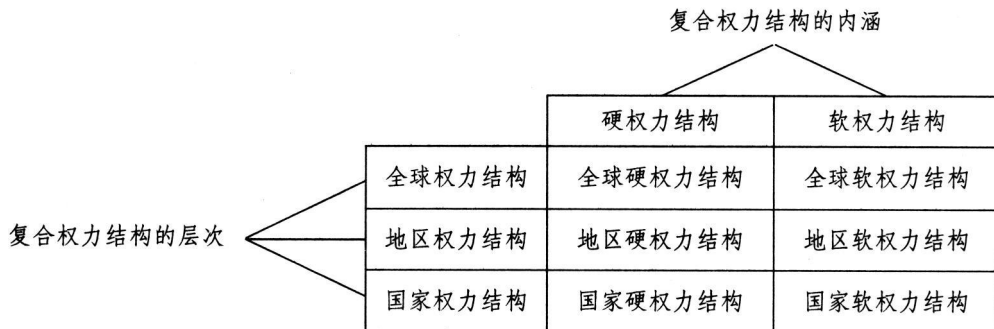
^④ Gordon Woo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awrence Kaplan ed.,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p. 129.

复合权力结构是一种多维力量的综合体系,横向上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两项内容,纵向上涉及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层次,决定着国际政治的广泛预期。就内涵而言,硬权力结构是指通过有形的刚性力量影响其他行为体行事的能力体系,主要涉及地理位置、人口状况、军事力量等内容。软权力结构是指通过无形的柔性力量影响其他行为体行事的能力体系,主要包括经济交往、社会文化、制度规范等内容。¹就层次而言,全球权力结构是指世界上各大陆国家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地区权力结构涉及区域内国家单位相互之间的相互联系,国家权力

结构包括分裂双方的内部结构与互动。

以“硬权力-软权力结构”为横坐标,“全球-地区-国家权力结构”为纵坐标,复合权力结构可以细化为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六个合成指标。就分裂国家统一问题而言,复合权力结构每一细分指标中都有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分别表现为:极的关系、意识形态、区域大国、区域主义、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社会。这些参考因素并不代表每一层次的所有内容,但它是每一层次中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见表1)

表1 复合权力结构的构成



德国统一问题的产生受到了复合权力结构的影响。就全球硬权力结构而言,德国分裂是美苏两极对峙的产物。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达成关于彻底铲除德国与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决议,并重新绘制了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雅尔塔体系的地缘政治对峙的关键在欧洲,对峙焦点在德国,德国的分裂难以避免。就全球软权力结构而言,德国的分裂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密切相关。冷战的爆发使得美苏英法四大占领国之间缺乏必要的合作基础。西占区和苏占区分别采取了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改革。1949年9月,西德成立后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同年10月,东德成立并归入社会主义阵营。两德的成立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归属固化了国家的分裂状态。

就地区硬权力结构而言,德国的分裂与其邻国

法国的介入有一定联系。二战期间,身受丧国之辱的法国坚持要求盟国严惩德国。借助美苏冷战爆发的大背景,以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平衡政策,法国如愿以偿地肢解了德国,并在相当长一时期内消除了来自邻国的巨大威胁。就地区软权力结构而言,欧洲霍布斯主义局势是德国分裂的重要背景。统一的德国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过于强大。^④特别是

¹ 约瑟夫·奈曾将权力划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两大部分,认为硬权力是通过威胁或者奖励,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涉及军事和经济力量等具体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权力”(hard command power);软权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之能力,涉及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笔者认为奈的软硬权力的划分关注的是权力的实施方式,忽视了权力本身的实质内涵。本文拟就以权力本身有形的刚性、无形的柔性力量为划分标准,并将其冠名“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尝试以权力的本质内涵为基点对权力结构进行深层解读。

^④ George F. Kennan “Disentangle Rethinking”, *Foreign Affairs* Vol 37 January, 1959 p 196.

“在冷战期间德意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活动空间”。¹ 统一的德国无论身处哪一阵营, 都是对另一方巨大的威胁。因此, 依靠均势维持安全的欧洲没有统一的德国的位置, 而欧洲的分裂也将长时间固化德国的分裂状态。

就国家硬权力结构而言, 东西德国政治军事对立的状态加剧了国家的分裂。1955年实行联邦共和制的西德加入了西方阵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东德, 成为苏东阵营华沙条约组织的一员。各方均认为自身是德国的唯一代表, 否认对方政府的合法存在。1973年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 国家的分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就国家软权力结构而言, 二战中德国的言行导致了他国对德意志民族强烈的不信任感。外界普遍认为“德国统一后可能表现出的政治攻击性, 不单单是对国家利益合法性的追求, 更是德国国民性格的外在表现”。^④ 国际社会对德国民族意识与种族主义的彻底分离缺乏信心, 因而分裂德国成为了寻求国际安全的必须。

德国统一问题的产生是复合权力结构影响的产物, 德国的和平统一也是复合权力结构中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层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德国和平统一的全球权力结构

德国和平统一进程受到了全球权力结构的影响, 其中全球硬权力结构体现为以美苏为特征的两极因素, 全球软权力结构表现为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

就全球硬权力结构而言, “美苏两极的失衡”与“苏联在欧洲的战略收缩”是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两大内容。在美苏对峙的冷战状态中, 两国都竭力维持东西德国在国际社会的共存。20世纪 60年代初, 为避免柏林冲突的升级,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在公开场合正式表示苏联有必要修建柏林墙。^④ 赫鲁晓夫也对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表现的合作态度”表示满意。^⑤ 1989年底, 戈尔巴乔夫还坚持“必须从战后的现实出发——存在两个主权的德意志国家, 两个联合国会员国, 背离这点将会导致欧洲的不稳定”。然而, 苏联实力的衰落已经不能再支持其

在德国问题上的强硬政策。1990年初, 戈尔巴乔夫对访苏的东德总理莫德罗表示“德国统一是毫无疑问的”。2月, 戈氏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会谈时, 明确表示苏联与两德一样, 对德意志统一不存在分歧。^⑥

苏联在欧洲影响力的下降也促使其在德国问题上一再妥协。1989年 7月, 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 “任何对他国国内事务的干涉以及任何对国家主权的限制都是不允许的”。^⑦ 随着苏联在欧洲影响力的缩减, 针对德国问题苏联曾提出了“统一的德国应该中立化”、“应该同时加入华约与北约”、“坚决反对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的三阶段主张。1990年 7月, 在东欧剧变蔓延以及对西方经济援助的迫切需求下, 苏联最终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苏联不再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 仅主张德国的统一应被纳入欧洲框架之内。1990年 7月, 西德总理科尔访苏时, 苏联表示统一的德国有权决定属于哪个联盟, 并规定 3-4年内苏军从东德撤出。苏联的默认促成了德国统一的最终实现。

就全球软权力结构而言, “苏联在东德影响力的下降”与“美苏默认德国主导统一”是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两大表现。东德成立、稳固, 以及被西德吸收的进程中, 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苏联的影子。东德建国初期, 苏联强调东德是代表德国的唯一政府。50年代, 苏联通过在华约中的领导权, 将东德军事建设纳入苏联的规划之中。1955年, 苏联与西德正式建交后, 要求东德放弃国家统一计划。1966年, 在苏联的压力下, 东德公开表示反对德国统一。然而, 20世纪 80年代末自身陷入危机的苏联再也无暇顾及东德的政治命运。1990年 1月, 东德总理莫

¹ 辛蕾:《融入欧洲: 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 第 66页。

^④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

^⑤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 C.: GPO, 1962, pp. 533 - 540.

^⑥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CDSP 13, No. 41, p. 5.

^⑦ 李华:“戈尔巴乔夫与 1990年的德国统一”,《德国研究》2005年第 3期, 第 29页。

^⑧ Gorbachev's Speech at 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in Strasbourg on July 6, 1989, in *Eruopa - Arhiv*, Vol. 44, 1989, p. D588.

德罗访苏时,当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无力再对东德政治与财政危机伸出援手时,莫德罗“已经意识到德意志民主德国即将终结”。¹ 在东德的民主大选中,面对西方国家特别是西德政府的介入,苏联无力也无心再扮演支持长期执掌东德政权的统一社会党的角色。缺乏苏联的支持,原社会统一党掌握的东德政权难以继续生存。

苏联退让的同时,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也经历了从反对、迟疑、到最终支持的转变。1955年美国将西德纳入北约轨道对抗苏联。柏林危机之后,美国赞同西德的东方政策,并寻求两德的并存。80年代末,在德国局势的变动中,美国的态度仍摇摆不定,关于德国的“A”、“B”计划争论不休。^④ 1989年底,布什还曾表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国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但是到了1990年初,东德形势的骤变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表示,“德国统一不仅是‘现实的’,而且也是‘可行的’”。1990年2月,美国提出了“2+4”方案,并得到了苏联与西方盟国的赞同。5月,布什提出了旨在使统一的德国继续留在北约中的“九点计划”,并得到了苏联的默认。1990年10月1日,美苏英法和两德签署协议,宣布停止四国在柏林和德国行使权力,为德国在3日正式实现统一做出了最后的关键性准备。

综上观之,德国的和平统一与全球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就硬权力结构而言,美苏两极在全球与欧洲的力量从平衡转为失衡;就软权力结构而言,苏美在东西德国影响力的平衡状态因苏联在东德的撤退而转向失衡。(见表2)

表2 全球权力结构与德国和平统一

	国家分裂	国家统一
全球硬权力结构	两极在全球与地区的平衡	两极在全球与地区的失衡
全球软权力结构	两极在分裂双方影响力的平衡	两极在分裂双方影响力的失衡

三、德国和平统一的地区权力结构

德国和平统一进程受到了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地区硬权力结构体现为法国的地区大国因素,地区软权力结构表现为欧共体这一区域组织因

素。

就地区硬权力结构而言,“法国与东西德国的缓和”与“法国默认西德吸收统一”是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两大因素。作为欧洲大陆历史上的宿敌,法国坚持“德国的分裂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与稳定”。^(四) 然而,冷战的升级促使法国与西德关系得以缓和。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是法德关系改善的起点。1963年《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967年法德主导筹建了欧洲共同体。80年代,两国开启了“联盟中的联盟合作”,成为了“欧洲整合的巨大动力”。^{1/4} 法国与东德的关系也得以改善。1949年当东德在苏占区的基础上成立时,法国对东德是不予承认的。70年代,随着欧洲局势的变化,法国与东德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法国这一区域大国与东西德国关系的缓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东西德国统一的和平主义取向。

法国对德国统一从“反对”到“默认”的转变,消除了该进程的最大地区障碍。80年代末,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应急外交试图延缓和阻止德国统一。1989年11月,法国期望英法联手制约德国。^{1/2} 12月6日,密特朗向戈尔巴乔夫表示“两个德意志主权国家”应当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16日,密特朗与美国布什总统会晤时,主张让科尔放慢德国统一的节奏。20日,密特朗赴东德访问,表示对东德“作为主权国家的继续存在感兴趣”。^{1/3} 但是,苏联的放弃、美国的支持,以及英国的沉默使得法国已经无力阻

¹ Manfred Gortemaker, *Unifying Germany 1989 - 19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245.

^④ “A计划”认为,德国的统一值得欢迎,美国应使德国逐步实现非军事化和中立化,以结束欧洲的分裂状态。“B计划”则主张应当继续维持两德并存的现状,美国应该继续保持西欧的持续稳定与安全。参见:《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四) A. W. Deporte,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Bala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 Helmut Kohl, “Policy Statement by Helmut Kohl, Federal Chancellor, to the Bundestag”, *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Bonn: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1998, p. 378.

^{1/2} Eduard Shevardnadze, *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 76.

^{1/3} 李寒秋:“两德统一棋局中的大国博弈”,《世界军事》,2006年第11期,第8-9页。

挡德国统一的车轮。¹ 当德国接受法国提出的“以马克换东德、承认波德边界”两大先决条件后,法国表示“不再反对德国统一,转而默认西德主导统一进程”^④。

就地区软权力结构而言,“东西德国处于欧共体之中”与“德国问题受到区域规范的制约”是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两大表现。二战后,欧洲国家认为只有建立欧洲联合体,使德国成为其中一员,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⑤ 处于分裂状态下的西德也急需借助地区合作来获得外部安全与内部稳定。1967年,通过加入欧共体的地区框架,西德卸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并得以重获主权、重组军队、重建经济。1988年,在欧洲缓和的背景下,东德与欧共体的关系也得以改善。1990年4月,在西德重申“欧洲是每一个德国人的未来”的保证下,欧共体开始接纳德国的统一进程,并向东德敞开了大门。欧共体与东德在仅半年的短暂时间内开展了深入的技术性合作、灵活的行政性交往,以及弹性的政治性接触。^⑥ 在德国统一之前,东德实质上已经被纳入到了欧共体的轨道,欧共体成为了两德合作的有效渠道。

欧共体对两德内部关系的确定以及德国的欧洲认同,为和平统一进程搭建了洛克主义文化的平台。欧共体《罗马条约》的“特别备忘录”表明,“西德政府仍持有其对东德贸易政策的权限”,“两德之间的贸易进出口为零关税”。^⑦ 条约还从国际法上保证了两德民众来往的自由,并将两德的合作机构视为内部协调组织。^⑧ 1988年“德国双边经济援助委员会”与欧共体达成协议,此举体现了德国对欧共体“内部一致性建设”的忠诚。^⑨ 德国欧共体政策的实践加强了其欧洲认同,欧洲的属性也赋予了德国强调和平与合作的安全理念。西德总理勃兰特一再强调不采用“重新统一”(reunification)或“德国统一”(German unity)的词语,^⑩ 避免引起欧洲国家担心,以此创造有利于统一的地区环境。

由上观之,德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与地区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就地区硬权力结构而言,法国与东西德国两方均实现了缓和;就地区软权力结构而言,东西德国均被纳入欧共体这一区域组织之中,欧洲霍

布斯主义文化向洛克主义文化的转变为两德和平统一提供了地区平台。(见表3)

表3 地区权力结构与德国和平统一

	国家分裂	国家统一
地区硬权力结构	地区大国与分裂一方的对立	地区大国与分裂双方缓和
地区软权力结构	分裂双方不受区域组织规范制约	分裂双方受到区域组织规范制约

四、德国和平统一的国家权力结构

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也受到了国家权力结构的影响,其中国家硬权力结构体现为东西德国的政治、军事因素,国家软权力结构表现为东西德国的经济、社会因素。

就国家硬权力结构而言,“东西德国政治、军事缓和”与“西德主导和平统一进程”是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两大重要内容。1949年西德、东德相继成立后,对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双方的敌视与冲突。^⑪ 20世纪50年代中,两德分别加入北约与华约,东西方军事同盟间的矛盾直接体现在德国问题上。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双方已经视国家分裂为常态。^⑫ 柏林墙修建后,东西德领导人均认为德国民族在现

¹ Ronald A. Smith, *German Unification and Its Ramifica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1991, p. 60

^④ Edwin S. Campbell, *Germany's Past and Europe's Future*, Washington, D. C.: Pergamon 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 1989, p. 188.

^⑤ Gert-Joachim Gausner, *The Unification Process in Germany: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London: Guildford and King's Lynn Press, 1992, p. 18.

^⑥ Lily Gardner Feldman, "The EC and German Unification", Leon Hurwitz and Christian Lequesne eds.,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Policies, Institutions and Debates in the Transition Year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1.

^⑦ H. G. Peter W. Alach and Ronald A. Francisco, *United Germany: The Past, Politics, Prospects*, Praeger,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2, p. 144.

^⑧ Ernest D. Plock, *The Basic Treaty and the Evolution of East-West German Rel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1986, pp. 138-140.

^⑨ Lily Gardner Feldman, "Germany and the EC: Realism and Responsibil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31, Jan., 1994, p. 32.

^⑩ Robert Gerald Livingston, "United Germany: Bigger and Better", *Foreign Policy*, No. 87, Summer 1992, p. 158.

^⑪ Peter J. Katzenstein, *Policy and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7.

^⑫ D. Kahneman, A. Slovic and A. Tversky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35-354.

实历史环境下难以再次统一。¹ 1969年,西德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承认民主德国为德国分裂状态下的另一个德意志国家,双方关系得以缓和。1972年,两德签署了寻求和平共处的《基础条约》,该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统一的和平道路取向。

西德支持的“德国联盟”在东德选举中获胜,也为西德和平吸纳东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1989年末,在东德自由选举前夕,来自基民盟的西德总理科尔以东德的基民盟为主体,在民主德国内部筹建了一个选举阵线“德国联盟”,并6次亲自赴东德参加选战活动。巨大的经济吸引力使得“德国联盟”在全国选举中以近3/4的选票获胜,并与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西德支持的东德新政府上台后,德国和平统一进程加速。1990年9月,东西德国与美苏英法签署《德国统一条约》,东西德国接受“无核区”的要求,保证在三四年内把统一后的德国武装力量裁减45%,人数减至37万。条约确定统一后的德国有权选择归属的联盟,北约成为其最终选择,德国统一进程实现关键性突破。

就国家软权力结构而言,“东西德国经济社会整合”与“西德主导经济社会统一进程”是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中的两大表现。东西德国政治关系的起伏并没有严重影响“德意志内部经济社会关系”的特殊状态。早在1951年,两德就签署了一项关于贸易的“柏林协定”,该协定对双方之间的商品、劳动和支付往来等问题做了相关规定,确定了贸易往来的双边支付通过各自的中央银行以结算单位方式计算。1957年,欧共体的附加议定书又进一步保证了两德内部贸易的特殊关系。至1988年,两德贸易额已增至144.71亿马克,经贸成为维系东西德关系的重要纽带。东西德国还在边境管理、官方援助、旅游过境往来、交通邮电、卫生体育、非商业性支付、家庭团聚以及记者工作条件等领域签署了法律文件。社会领域交往的深化使得德意志民族重新获得了审视自我的机会。两国的紧密交流引发了东德国内传统与历史的回归风潮,也消除了西德对东德厌恶情绪的表达,“德意志美德”重新成为了双方的共同追求。

统一进程中西德马克的吸引力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引导力也不可小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德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1989年西德贸易顺差为810亿美元;^④同年,东德的财政赤字高达700亿美元,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分别达到76万和186万。^⑤1990年东德自由选举中,强劲的西德马克对东德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此情况下,西德支持的“德国联盟”获胜已在预料之中。1990年5月,东德新政府与西德签署了《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西德主导的统一进程进入实质阶段。此外,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50年成立的基民盟在西德历史上长期与基社盟一道执掌国家政权。东德的基民盟于1954年建党,1989年该党宣布与统一社会党决裂,在自由选举中与西德基民盟展开了深入合作,建立了选举阵线“德国联盟”并取得竞选成功。1990年10月,西德和东德的基民盟举行合并党代会,西德总理、基民盟主席科尔当选主席,并成为德国统一后的首位总理。

综上观之,德国的和平统一模式的选择受到了国家权力结构因素的影响。就硬权力结构而言,东西德国摆脱了原有军事敌对、政治敌视的阴影,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就软权力结构而言,两德经济合作、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加强,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进程。(见表4)

表4 国家权力结构与德国和平统一

	国家分裂	国家统一
全球硬权力结构	分裂双方政治军事对立	分裂双方政治军事缓和
全球软权力结构	分裂双方经济社会离散	分裂双方经济社会整合

结论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分裂状态,德国最终通过

¹ F. Stephen Larabee ed., *The Two German States and European Secur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 94

^④ Manfred Gontmaler, *Unifying Germany 1989 - 19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232

^⑤ Treuhandanstalt, *The Chance of the 90's Investing in Eastern Germany*, Berlin, 1991, p. 7

和平模式实现了国家统一。在德国和平统一进程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六项因素均发生了变化。因此,德国统一进程不是“行为体取向”单一发展的逻辑,而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该研究结论对深入认识中国的统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前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也受到复合权力结构的影响。全球硬软权力结构均已发生变化:冷战的两极格局及其对台海的影响已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全球权力结构中的关键因素。地区硬软权力结构变化不大:地区大国日本虽已与两岸关系缓和,但中日政治关系冷淡;东亚地区仍处于霍布斯主义文化状

态,区域组织规范对两岸关系影响有限。国家权力硬软结构有较大的变化:大陆与台湾政治军事出现缓和,经济社会交往不断深入。

在当前国家硬权力结构已趋缓和、国家软权力结构迈向整合的良好形势下,中国大陆应积极关注其他权力结构因素及其转变。在全球层面上,中美政治关系的友好发展与经济关系的深入合作,将有助于减少美国在中国和平统一问题上的阻碍。在地区层面上,东亚区域主义的推进将有助于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并将有利于构建和平统一的地区机制与规范。○

(责任编辑:张浩)

(接第 53 页)概念混乱的例子;二是由于概念混乱,新现实主义对手甚至不知道自己这一派的名称应该是什么。这种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从内容上看,新现实主义在论战中的主要观点仍是现实主义那一套,如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把国家作为主要的行为单位、重视国家利益、权力分配等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与理想主义基本雷同,如强调全球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重视非国家角色等等。

其实从逻辑上讲,新现实主义的论战对手应该是新理想主义。在这里我们把新现实主义定义为以传统现实主义的硬理论为主、以理想主义的软理论为辅的理想现实主义理论,而把新理想主义定义为以传统的理想主义软理论为主、以现实主义的硬理论为辅的现实理想主义理论。也就是说,新现实主义和新理想主义中都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分,但重点不同。这一点可以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史得到佐证。早期的国际关系实践如霍布斯所言基本上只能用现实主义加以解释。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化,理想主义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

并逐渐发展壮大。现实与理想,或者说硬理论与软理论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这两部分应当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何种比例,这才是新现实主义和新理想主义应该辩论的题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套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既包括硬理论,也包括软理论,二者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套用“巧实力”的说法,它应该是一种“巧理论”,即“巧妙地把硬理论和软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国内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拟建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参考中国古代哲学和战略思想以外,也要借鉴对我们有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概念,且借鉴时应该对本文提出的硬理论和软理论一视同仁地加以重视,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取一种理论加以修改更新。这种硬、软理论的有机结合应该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创新,也是对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的一个考验。○

(责任编辑:张浩)